

景觀

後殖民文化中的香港建築

• 方 元

香港在經過「九七回歸」這個巨大的社會變革之後，需要有一種新的文化為自己重新定位。「九七」前，香港文化是以外來殖民統治者為主體的殖民主義文化；「九七」後，香港則要轉變為以原殖民地人民為主體的後殖民文化。因此，當原來作為小配角的殖民地建築文化要轉為唱大戲的主角的時候，原來的文化審美標準勢必要變，原來的文化次序勢必要被打亂。有甚麼樣的文化，就有甚麼樣的建築。「九七」後的香港建築，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後殖民文化的道路。然而，這是一條甚麼樣的道路呢？

一 主權回歸不等於文化回歸

從民族的角度講，香港與中國大陸是同祖同宗，但是從建築文化的角度而言，香港與大陸則難說是同根同源。香港的近現代建築文化是殖民地歷史的產物。儘管中英《聯合聲明》規定了主權回歸的時間，但是並未限定文化回歸的時間。華人雖然佔香港人口的95%，但是香港的主流文化卻是西方的文化。

「九七」以後，英國的影響繼續存在，正如「末代總督」彭定康 (Christopher Patten) 在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意味深長的說：「儘管我會離去，但英國，除了從憲制這個重要的角度而言可以說會撤離外，其實並不會離開香港。……我們還有其他方面的聯繫，例如語言、教育、專業和文化，而大家更有共同的經歷和體驗。」^①在建築上，殖民地時期歷代遺留下來的舊建築，毫無疑問是香港建築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新竣工的新機場客運大樓、新九廣鐵路客運總站以及英國總領事館及英國文化協會大樓等，則為香港建築添加了最新的英國文化「遺產」。港英時代留下的建築法規、建築教育體系、建築師考核制度，以及富殖民地色彩的建築和街道命名等，作為文本存在物，使香港仍然保持在英國的體制和文化中。

如果說香港在政治上曾是英國的殖民地，那麼在建築文化上，則是美國的殖民地。這樣的講法雖然誇張，但是從舉目皆是商業摩天大樓，到無處不在的「麥當勞」快餐店，誰也難以否認美國對香港商業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影響。由美國建築師參與設計的力寶中心 (Paul Rudolph)、中銀大廈

(貝聿銘)以及最近落成的國際金融中心(Ceaser Pelli)，都是香港城市輪廓線上突出的控制點。不知是機緣巧合還是歷史的弔詭，見證中英香港主權交接大典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也是由美國建築師(SOM)參與設計的。「九七」後的最大工程——迪士尼主題公園，將為香港帶來最典型的美式建築文化，給處於成長期的香港後殖民文化加入更多的美國奶粉。

除了英國和美國建築文化的烙印，日本文化在香港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港島的銅鑼灣和九龍的旺角商業區，日式的百貨公司建築，日本的pop文化形式比比皆是。在公共建築和住宅建築中，隨處都可見到具有日本特色的面磚外牆。這種質地光滑、色彩嬌柔和精巧細緻的外牆材料，恰好表現了殖民地文化的女性隱喻。

由於港英時代的文化基礎脆若薄冰，令香港的本土文化自信不堪一擊。脫離英國前夕，香港陷入「戀英情結」，歐洲古典風格的建築形式充斥市場，並在1980年代，匆匆請來英國大師福斯特(Norman Foster)為這座殖民地「邊城」留下幾處「國際大都市」的應景建築。既然留不下「洋大人」，就多留些「西洋景」。脫離英國之後，香港又患上了「文化恐慌症」，對自己在東南亞經濟中的領導地位缺乏安全感，缺乏競爭信心；外怕新加坡，內懼上海。1999年落成的回歸紀念碑，在會展中心的龐大形體和開闊海景的對比下，纖細的黑色柱身像是一具先天不足和自卑的陽具，把殖民地文化的萎靡不振暴露無遺。香港建築何時走出殖民主義文化的陰影，取決於香港後殖民文化的成長。

二 大都市規模，小城市文化

香港特區政府1999年提出要把香港建成亞洲的倫敦和紐約^②。如果這幅藍圖的背後仍然是「殖民地邊緣」仿照「西方中心」的理念，那麼，儘管香港脫離了殖民地身份，卻仍未跳出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的衛星軌道。另一方面，在城市建設上，由於香港缺少像倫敦、紐約那樣的國際中心所具備的政治和文化條件，因此，香港從來沒有出現過像倫敦國會大廈、紐約聯合國總部那樣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影響力的建築。香港的文化成就與它的經濟發展是不成正比的。作為東西方貿易中心、「現代威尼斯」的香港，與商業暨藝術共同繁榮的古商城相比，在建築文化的貢獻方面，只能望其項背。這種「大都市規模、小城市文化」的現象，是殖民地城市畸形發展的結果。

即使與英印時代的印度比較，香港的政府建築也是自愧不如的。英屬殖民地的總督府通常是非常重要的建築。殖民者通過展現和炫耀自己的文化，特別是利用行政建築的象徵意義，強化殖民者的管治威信，使其殖民主義統治得到認可及合法化，例如，1930年建成的新德里總督府即是由當時的英國建築權威勒琴斯(Edwin Lutyens)設計和規劃的，它被看作是英國建築文化在印度的顛峰之作。但是在香港，無論是總督府或其他政府建築，實在乏善足陳。香港最有影響力的建築是銀行和大財團的辦公樓，如中環的匯豐銀行總部、怡和大廈。政府建築與商業大廈相比，孰強孰弱，社會中心之所在，不言而喻。雖

然政府與商業集團的角色不同、功能不同，但是政府的辦公樓在外觀上與商業建築並沒有甚麼兩樣。

香港歷來就是一個政治避風港的商業王國。「商業主義」是香港建築文化的核心。香港建築文化的潮流不是由建築師引導的，而是受地產發展商所左右。香港的建築設計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商人」為本，以經濟利益為本。在香港，建築以及城市建設往往被當作是純粹的經濟運作，它們作為城市文化的影響和作用被忽視了。如果香港能夠在賺錢和文化建設之間作出平衡，進而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引導經濟發展，香港才能真正進入像倫敦、紐約這樣一流國際大都市的行列。

香港的城市形象是以群體建築來體現的，它雖然沒有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巴黎的埃菲爾鐵塔或悉尼的歌劇院這樣的單一的標誌性城市建築，但是也不會與其他城市混淆。香港高密度的高層建築群體集合形成了一種超級的城市哥特風景。這種充滿了生氣的「商民階級」的藝術風格，是香港商業之都恰如其分的寫照。

香港的城市結構和形態既不是西方式的英國城市版本，也不是東方式的中國城市版本。實際上，香港城市建設的發展方向一直是另闢途徑的，是經濟行為塑造文化模式的實例。雖然香港局部存在着中、西方城市的隻言片語，但是整體上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體系。香港的城市景觀，像是由若干歷史的跳躍和文化的斷層組成的：斷章取義切入城市一隅的異國情調，新舊對比的異峰突起，經常給人以意想不到的驚奇，有時令人讚歎，有時又令人無奈。它們表現了這個移

民城市對移民經歷的支離破碎的回憶。

三 溫和的「新民族主義」

儘管民族文化在殖民地遭受否定和壓制，但是它可以長期被埋藏在本土文化的深層，等到春暖冰消的時刻，就會萌發出無限生機。而宗教領域則是一塊最好的土壤。香港著名的「黃大仙」、「天后」、「文武帝」等寺廟建設及其香火繁盛的廟會活動，是殖民地早期的民族主義借用宗教、神話的形式延續本土文化的方式和場所，在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下，保留了民族文化和本土民族建築的血脈。

1997年香港佛教「志蓮淨苑」工程，是香港民族文化復興的第一波。這項重建工程通過舉辦「唐代佛寺藝術展覽」等文化活動，在香港社會引起了廣泛的回響。儘管志蓮淨苑的建築形式對於現代城市建設不具有普遍意義，但是它通過仿照唐代佛寺的建築，重建傳統和重述歷史，「借花獻佛」，為香港的後殖民建築提供了再創造的原型。

志蓮淨苑的重建可以被看作是香港新民族主義的宣言。一方面它在民族文化的寶藏中尋回傳統作為新文化的根基，提倡把「傳統」當作「文化」來解讀，讓殖民時代被貶低的民族文化重拾信心和自尊；另一方面，它以唐代建築形式比喻中外文化融會的昌盛時期，提倡對西方文化兼蓄包容的「嶄新的東方文化」，與舊的民族主義劃清界線。這種溫和的、開明的新民族主義將有利於香港吸收不同的文化，打破香港殖民主義單一文化的圍城。

四 「後現代主義」的幫襯

香港的後殖民文化既不甘心恢復正宗的民族主義文化，又不能繼續殖民主義的文化，而是要把對立的、相互排斥的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文化分解、雜交，然後在兩個主體文化體制的邊緣上，建立起香港的後殖民文化。香港建築能否在後殖民文化中生長，尚需時間證明。在這方面，新建的香港中央圖書館大樓恰好反映了香港建築文化此時此刻的彷徨。

香港中央圖書館，從1992年構思、經1998年設計競賽、到2001年啟用，跨越了「九七」政治「新紀元」和2000曆法。建築師為了體現「中西文化互融的香港特色」，提出了「中國內涵，希臘外觀」的設計方案。為此，建築師採用了「後現代主義」的設計手法，別出心裁地將代表「民主」的希臘神殿座落在一個巨大的、有商業主義寓意的「威尼斯窗」的圓拱上。這個反邏輯的建築組合，似乎在嘲笑「港式民主」的尷尬處境。建築中虛實交替出現的歷史與現代的建築符號，表現了香港在兩難之間，對昔日的戀戀不捨和對前途的迷離惆悵。

建築師有意無意的設計，正好反映了香港的社會和政治情景。而借用「後現代主義」的手法來改變原有的文化秩序和格局，對於後殖民文化是再合適不過的了。更巧妙的是，「後殖民文化」和「後現代主義」是一對互相幫襯的患難兄弟，它們在模仿、借用、隱喻、矛盾和多元化的性格上，以及模稜兩可的曖昧性方面有着共同之處。

受西方教育的本土知識份子，熟悉西方的文化多於民族的、本土的文化，因此，在開始編織新語言的時

候，由於表達本土文化的困難，不得不借助西方文化的表達方式。在建築的平面上，建築師以四正合圍的設計比喻中國傳統的四合院，試圖以此賦予圖書館「中國的內涵」，但是空間的布局 and 比例上卻更像是羅馬建築的「中庭」。建築師為圖書館主體外牆選用了暖黃色調，除了配合建築的古典風格外，也包含了「中國」的寓意。然而，在西洋古典外衣的包裝下，建築的內部卻是簡潔的「現代主義」設計；在這層「代表中國人」的黃色「皮膚」下，包裹的則是西方文化的靈魂和內涵。

儘管建築師嘔心瀝血、巧妙構思，但是仍然難以使中央圖書館在原有文化體系中破繭而出，不僅未能為香港建築文化找到新的途徑，反而自己也迷失了方向，其結果是一個斷章取義的、夾雜不同文化元素的、生砌硬造的混合體。這種「文化混雜」是殖民地文化的一個主要特色。當香港脫離英國以後，這種混雜性遺傳下來，成為香港後殖民文化中與生俱有的基因。長期的文化混雜狀況使香港不受任何傳統的約束。香港從來沒有過甚麼學院派的建築，香港的西洋古典主義建築可以不必擔心柱式比例；現代主義建築可以不必理會簡潔和理性的原則。

雖然殖民主義要將西方文化原樣照搬到殖民地，但其結果只能產生出半洋半土的雜交文化。正像最近十幾年，在香港流行的一種以廣東和英語詞彙混合而成的“Cantoglish”方言，這種後殖民文化所特有的「語碼混雜」現象，也是香港建築文化的特徵，例如：重新組合原有的建築語言結構；把不同風格、不同時代和不同文化的建築元素嫁接在一起；錯誤地排列建築語言；甚至使用不正確的建築詞彙

等。這種「語碼混雜」的現象正是後殖民文化的起步，是後殖民文化對於傳統文化權威性的反叛和挑戰。後殖民地地區的人民正是需要通過對原宗主國文化的模仿、異化、錯位、甚至濫用，使它逐漸本土化。這種不規範的、開放型的、無確定邊界的文化模式，為香港建築帶來了永不休止的活力。

五 「中產」就是「房產」

中產階級的經濟能力，是整個社會的富裕水準和現代化程度的指數。在香港，與中產階級關係最密切的建築莫過於住宅；甚至可以說，香港的中產階級就是「房產階級」。一套數百萬元至千萬元的單元住房是香港「草根階層」的「夢」，「夾心階層」的「痛」，以及衡量中產家庭社會地位的「秤」。香港的中產階級是香港住宅市場中的重要支柱，因此，私人住宅建築的設計反映了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文化。香港住宅中有許多典型的本土建築詞彙，例如凸窗、「剪刀式」樓梯、「鑽石」型平面、空調機窗板等。特別是凸窗，它是在香港寸土寸金的居住條件下和建築規範限制下所派生出的最有香港特點的一個經典之作，它的窗台曾作為兒童的「臥室」，伴隨着香港人的成長，對香港建築文化有着特殊的意義。

通過住宅建築的命名而形成的「建築命名文學」是香港建築文化的另一個突出的特點，它投射出香港中產族群的理想、社會觀念、文化的品位和背景。其中有直接標榜經濟地位的大號，如「富豪花園」、「豪園」；有倡導環保意識的標題，如「茵怡花園」；也

有追求生活情調和居留意境的點意，如「逸意居」等。這種香港文化風情，像是北京的「胡同文學」，是典型的本土文化，而不是英國的舶來品。比之香港的公共建築和辦公樓，香港的住宅更貼近香港的本土文化。經過「金融風暴」洗刷的香港中產階級將會更加成熟，成為香港建築文化的中堅。

香港的建築看上去繁花似錦，然而，香港在學習西方或繼承中國建築文化的過程中，並沒有在任何一種文化土壤中深深地紮下根。香港建築150年，既沒有納入英帝國的建築史，也沒有寫進中國的建築史。因此，香港建築在走上後殖民文化道路的時候，需做好兩件事：第一，修補歷史：把殖民時期殘缺不全的本土歷史進行整理和重述，為本土建築文化打下堅實的基礎；第二，文化轉型：通過對殖民地文化的去糟取精，增強民族的、本土的自我意識，由附屬的、邊緣的「二等」文化轉變到自主的、區域中心的文化。「九七」後的香港建築能否成為中國建築史中獨立的一章，並在「一國兩制」下保持香港建築的特點？讓我們翹首以待。

註釋

① Christopher Patten, *Hong Kong: Transi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96), 16

② 香港特區政府：《1999年施政報告》，卷二（香港：政府印務局，1999），頁194。

方元 英國愛丁堡大學建築學博士，建築師，中國建築學會會員。